

在读

# “随笔”中的新史料、新问题、学术史

徐畅

《三升斋随笔》是凤凰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学术名家文化随笔“凤凰枝文丛”系列中的一本，共收入作者荣新江老师的学术随笔31篇，按中外关系史、西域史、敦煌学、吐鲁番学、中古史五个不同领域排列。从自序可知，写作有两个学术背景，一是中国古典学术的“随笔”传统，一是西方现代学术的书评(Review)制度；如果将纳入本书的文章加以归类，读者自会发现，后者对作者的影响更为深远。

作者多年来一直提倡中国学术界建立健康的书评制度，自己亦坚持书评写作。本书所收17篇，包含了对专著、丛刊、目录、资料 and 论文集的述介，皆就学术前沿问题而发，“议论高简”(语出明马调元《重刻容斋随笔纪事》)。除书评外，笔谈、感言等文字，皆为作者在学术会议、报刊杂志上介绍学科研究动态的产物，既具有相当的学术高度，又深入浅出、提纲挈领，如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》《期盼“吐鲁番学”与“敦煌学”比翼齐飞》两篇，可谓浓缩敦煌学、吐鲁番学发展史，而《从“补史”到“重构”》则提示了未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学术走向。因此，本书名为“随笔”，却并不“随意”，而是与作者多年治学相伴生的“硬核”学术文字，如果将每一篇谈话、书评还原到当时语境，则全书也可视为一部学术史。

以下就作者的浅陋理解，谈谈由本书所见作者的治学路径与学术工作。作者为北大历史系出身，深受史料学学术传统的影响，在介绍新材料的使用时，引及陈寅恪先生《陈垣(敦煌劫余录)序》(287—288页)；其实，作者曾应中西书局之邀，为此《序》作长篇阐释，于开篇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，得预于此潮流者，谓之预流。向下按语：新材料和新问题，是构筑一时代新学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，寅恪先生在此不偏不倚地提示给我们。这个提示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。遗憾的是，中国的学术界却走向两个极端：或则追求材料，或则空谈问题”(《中西学术名篇解读·陈寅恪集》)。

他认为，“新材料”与“新问题”不仅是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极致学术追求，置诸当今之学术语境，仍为至理名言。“新材料”与“新问题”，也正是作者多年来坚守的治学路径。

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最东边有一间单独辟出的资料室，房号315，放置的都是大部头研究资料汇编，有国内外各大馆藏敦煌文献、敦煌石窟全集，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石刻图文编，各类考古报告等，品类齐全。新入学或修读荣新江老师敦煌吐鲁番课程的研究者，一般都会接触到进入315系统翻阅英、法、俄、国图敦煌文献的任务。后来大家知道，315其实就是荣老师心目中的北大图书馆219房间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追忆了1980年代初自己作为本科生“闯入”敦煌学的契机：高校恢复科研、教学后，在季羨林、周一良、宿白、王永兴、张广达等先生的帮助下，在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的支持下，北大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学课程；而北大图

书馆也专门为敦煌学开辟了一间研究室，即219房间，把英、法、北图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及500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集中起来，供有志于此的师生使用(139—140页)。作者作为学习委员，掌握着219的钥匙，并负责为调查资料的师生摇动微胶卷，因着这样的机会，他饱览了室内几乎所有的敦煌学著作，并将缩微胶卷前后过了三遍。

1984—1985年，作者读研究生，经张广达先生介绍，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，从欧洲知名汉学家许理和(Erik Zürcher)教授进修；他用了近两个月时间，独自走访伦敦、巴黎、柏林、不来梅、哥本哈根、斯德哥尔摩等地，调查和收集流散欧洲各个角落的敦煌、新疆出土文献，进展比较顺利，唯在赫尔辛基大学遭到拒绝，未得见Mannerheim Collection。本着做学问的彻底性(Gründlichkeit)，1990至1991年，作者到大谷文书的收藏单位——日本龙谷大学访问，在东京、京都、奈良等地调查中国西北出土文献，并向百济康义了解赫尔辛基、伊斯坦布尔所藏吐鲁番文书的情况(204页)；1991年，复由日本转赴伦敦，从事英藏S.6981—13677号汉文非佛教写卷的整理与编目工作(133页)，期间还走访了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、法国国立图书馆，调查俄藏、法藏敦煌文献。

此后，作者继续考察，于1996年访问德国，调查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；1996至1997年初访问美国耶鲁大学，调查北美藏敦煌吐鲁番文献；1997年访问法国，调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……就这样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作者成为为数不多的走访过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的中国学者。他曾总结这段海外调查经历：这个过程有不少心酸的经历，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，比如在英国图书馆比定出《列子》残片的时候(荣新江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》序)，1996年)。

作者本人践行太史公实地考察的传统，走在了出土纸写本调查的前列；虽然如此，他深知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获得未公布写本的信息。因此，他通过编制目录，如《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(S.6981—13677)》(1994年)、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》(2009年)，把调查所得贡献给当时仍稀缺海外资讯的国内同行们。而1990年代之后，由于国际合作的加强，出版界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，流散国内外外的敦煌文献开始以高清印刷的大本图录形式整理发表，并实现了数字化，在IDP等网站公布，文献的整理录本也紧随其后，喷涌而出。作者置身其间，为推动敦煌学学术资料整理刊布而努力的同时，也逐渐把目光转移至与敦煌文献具有同质性，同样遭到各国探险家劫掠、流散海内外的吐鲁番文献。

作者关注西域、丝绸之路，很早就注意到吐鲁番的交通通道地位，认识到此地出土文书对于西域史、隋唐史、中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，在1980年代，就应胡戟先生之邀，撰写过《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》这篇长文，是国内最早介绍吐鲁番历史的著作(收入胡戟等《吐鲁番》，1987年)；在协助编辑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过程中，曾向唐长孺先生的“吐鲁番出土文书”整理团队求教；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游学欧洲、日本时，亦将吐鲁番



敦煌莫高窟盛唐菩萨造像

文书作为写本调查的重要一环，清理过海外及中国散藏吐鲁番文书的“家底”(209页)，可以说一开始就站在吐鲁番学的高点。

国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，以唐长孺先生主持的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图文对照本为标杆，但此后吐鲁番地区考古所得，多未能以图文对照的文献合集形式问世，而国外收藏品亦有相当数量未得刊布。作者曾在各种场合呼吁文物部门、出版社和学者共同努力，尽快整理出版国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，以便更多学者加以利用；而他真正涉足吐鲁番文书的全面整理，则是在承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后。

在本书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编撰感言》篇，作者对整理经过进行了回顾：1997至2006年，吐鲁番文物局先后清理了洋海、阿斯塔那、巴达木、木纳尔等墓地，加上历年征集，所得古代文书多达300余件；2005年北大中古史中心与吐鲁番文物部门达成合作协议，由荣新江、李肖、孟宪实三位负责，组建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”，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团队确定的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为指导，按照最高的学术标准作业；经过读书班释读，核对原卷并进行拼接、缀合、复原，录入初定、撰写论文，据论文改进录入、定名，召开定稿会、向专家请教完善，图文最后对照的工作流程，于2007年完成了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；与中华书局合作，最终呈现给学界一套大八开、全彩版、上图下文、释文、释文、释文的高质量出土文献整理本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。与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图文对照本相比，得先进出版技术之助，《新获》不仅提供了所有文书的高清彩版照片，还实现了释文的激光照排，成为新时期出土文献整理的新标杆。2010年，该成果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——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(214—231页)。

凭借《新获》的整理出版经验，近年来，作者在持续推动海内外大宗及流散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，2021年新发表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回流旅顺博物馆的26000多片文书，最终成果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》以大八开、全彩版、35册大型出版物的形式呈现(中华书局出版)；而尚待发表的是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中非佛教材料的合集(荣新江、史睿主编《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》，中华书局待版)。

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耗时而艰辛，作者曾提及，“要知道给那些没有前后文，甚至只有半句残文的纸片一个确切名称，谈何容易”，“如果我们只做研究，完全可以选择较完整的文书，不必为一个、半个字去耗费精力”；但他仍选择承担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，认为“做学问的人总喜欢探索未知领域”，这是“接受了一项人生的挑战”(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》序，2010年)。在笔者看来，这是作者以搜求资料到整理发表资料的转型，通过这一转型，他不仅将个人“穷尽新史料”的治学目标推向纵深，亦为学界认识、了解新史料，搭建了一座津梁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、陈寅恪提出的“史学便是史科学”“取用新材料”以预流的学术主张，曾经被部分青年学人误解，在学界引发片面扩张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的不良风气，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，贺昌群先生就曾有这样的反思：

我想流入与不入流，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，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，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。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，然后才有所努力，在思辨上有深刻的眼光，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，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，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(《历史学的新途径》，载《中学生》杂志第61期“研究与经验”辑，1936年)。

本书作者用敦煌文书治敦煌学起家，曾经耗费大量时间、精力在新史料的调查、搜求、整理工作上，不少人称他为“出土文献整理专家”“文献学家”，而他却以新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，如贺昌群先生所言，她做一名“人流”的历史学家。21世纪初，当敦煌学的主要

学术资料基本问世，而写本研究走向“内卷化”之时，学术界弥漫着“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”之问；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，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“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”学术研讨会上，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。他说，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，从学术发展上，不宜自限边界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，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，来开发新的课题，提示了女性史、医疗史、书籍史、民族史、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(134—136页)；2019年在给《光明日报》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，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、医疗史、丝绸之路等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(183—184页)。

当然，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，自2000年起，他将已从文献到历史、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同学的一些研究生，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，采纳现代史学的视角，结合多学科理论，阐释“新敦煌学”；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，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，史睿、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，姚崇新、王媛媛、陈怀宇、刘屹分别讨论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，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。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，作者又领衔组稿，历时四年，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，名之曰“敦煌讲座”。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，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



学术资料基本问世，而写本研究走向“内卷化”之时，学术界弥漫着“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”之问；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，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“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”学术研讨会上，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。他说，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，从学术发展上，不宜自限边界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，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，来开发新的课题，提示了女性史、医疗史、书籍史、民族史、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(134—136页)；2019年在给《光明日报》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，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、医疗史、丝绸之路等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(183—184页)。

当然，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，自2000年起，他将已从文献到历史、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同学的一些研究生，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，采纳现代史学的视角，结合多学科理论，阐释“新敦煌学”；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，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，史睿、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，姚崇新、王媛媛、陈怀宇、刘屹分别讨论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，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。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，作者又领衔组稿，历时四年，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，名之曰“敦煌讲座”。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，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

学术资料基本问世，而写本研究走向“内卷化”之时，学术界弥漫着“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”之问；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，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“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”学术研讨会上，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。他说，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，从学术发展上，不宜自限边界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，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，来开发新的课题，提示了女性史、医疗史、书籍史、民族史、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(134—136页)；2019年在给《光明日报》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，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、医疗史、丝绸之路等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(183—184页)。

当然，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，自2000年起，他将已从文献到历史、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同学的一些研究生，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，采纳现代史学的视角，结合多学科理论，阐释“新敦煌学”；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，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，史睿、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，姚崇新、王媛媛、陈怀宇、刘屹分别讨论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，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。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，作者又领衔组稿，历时四年，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，名之曰“敦煌讲座”。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、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，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

## “布克夫人”还是“卜凯夫人”？

段怀清

1935年6月13日，《民报》发表“布克夫人赛珍珠离婚一小时即结婚”的报道。报道消息来源为国民社，而该条报道后又附路透社消息，推测国民社消息即来源于路透社。两条消息均为6月11日美国里诺电，而内容则大体一致。国民社消息说：

小说家赛珍珠女士，今日已与其夫布克教授离婚，一小时后即与纽约出版家华尔许在此结婚。赛女士以受其夫心理上之虐待、致健康上受损、引起身心不安为离婚理由。其二女则由布教授抚养，资产则予平分，同时华尔许之夫人，亦已取得准许离婚之判决，赛女士与华尔许在此之前，曾同居一年，非常和好。

相比之下，路透社的消息则略详细，电文如下：

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布克夫人与其夫(即金陵大学教授布克)离婚后，今日在此已获有与纽约发行人华尔许结婚之许可证。查华尔许近与其妻离婚，曾发行布克夫人所著之小说数种。布克夫人与华尔许夫人皆以不堪虐待请求离婚。而布克与华尔许皆中辨并无虐待行为。布克夫妇所有资产皆分配与所生子女二人，抚养将由双方协定。布克夫人赛珍珠在华多年，所著小说多关注和反映中国农村生活，其中最著名者为《大地》一书。

上述电文中所谓布克夫人，乃现代中文所通译，最为常见和常用。不过，对于当事人——赛珍珠和布克教授——来说，至少在当时，似乎更倾向于使用卜凯夫人，因为约翰·布克乃译名，而实际上布克教授是有一个自取的中文名字的，即卜凯。所以，赛珍珠在与卜凯的婚姻存续期间，在中文世界里更为他们夫妇所接受的称呼

当为卜凯与卜凯夫人。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赛珍珠卜凯夫人之名出现于中文世界里，一共有四条，分别为：

卜凯夫人演讲“著作之经验”，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》，1934年第7期；  
学校大事记(二十二年十月至二十三年五月)；  
二日：“大地”作者卜凯夫人来校演讲，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》，1934年，金陵年刊；

新地：《荒芜》，卜凯夫人，《农林新报》，1935年第35卷第1期；  
《荒芜的春天》，卜凯夫人原著，侯婉昭译述，《江苏学生》，1933年第2卷第1期；

实际上，在赛珍珠卜凯夫人之名出现于中文报刊上之前，早已以赛珍珠或布克夫人之名而为人所知，中文世界亦是如此。不过，至少在熟悉约翰·布克即卜凯者那里，赛珍珠或布克夫人更常见的称呼，则为卜凯夫人，上述四条，即可为证。赛珍珠1917年与约翰·布克在华盛顿结婚，于1935年二人在美离婚，这段婚姻，一共维系了18年。而这18年，恰恰是赛珍珠作为一个小说家从开始文学创作到声名鹊起的18年，而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小说《大地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其中都可以看到作为农学家的卜凯以及二人这段婚姻的某些存在。我们都知道，赛珍珠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“王龙”这一人物，是短篇小说《革命党》。而这位王龙，乃为南京郊区的一位农民；而《大地》中更为人们熟知的那个王龙，则生活于镇江以北、被众多赛珍珠研究者考证为安徽宿州。而无论是宿州还是南京，都与赛珍珠婚后的生活有关。而无论是在宿州的生活，还是在南京的生活，又都离不开卜凯。

上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中所刊两条，其实内容完全一致，就是对1934年1月10日下午(5时开始)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讲堂的一次公开演讲的报道。这则报道中引人注目之处，是赛珍珠演讲之前的一段开场白。她说：“在未说以前，我要申明几句话。我是一个美国人，但是我写的书，却是关于中国的。这一定使人奇怪。我为何不写本国而要写异国，这我可以很简单地说。因为我的过去的生活，可以说全部是在中国的。所以中国对我，比美国对我更更熟悉、接近。所以我不能阻止我要写中国的一种自然愿望。”

我们都知道，赛珍珠在重返美国并定居之前的40年，也可以说其前半生，基本上都是在外国度过的。尽管这样长的时间，在晚清以来的西方华人人士中，也并不算最长久者，但对于作为作家的赛珍珠来说，中国确实因此而成为她一生文学书写的“资源”。即便是在她后半生生活于美国期间，赛珍珠笔下写得最频繁、最流畅的，依然是中国。

而另外两条《荒芜》及《荒芜的春天》，其实均为赛珍珠的同一篇小说之译文。这篇小说在后来的小说集《结婚妻》中译本里，译为《春荒》。关于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，赛珍珠一共写了四篇小说，即《春荒》《逃荒者》《父与母》和《大江》。这四篇小说的小集标题为《洪水》。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，大概都不会忘记其开篇与结尾，也不容易忘记赛珍珠对于那位在二月将逝的一个和暖的黄昏、坐在自家小屋里前、面对着家门口大水过后景象的刘农民的心情的描写。而这，只不过是赛珍珠所描写的同一主题的其中一景而已。

论衡



赛珍珠

令人关注的是，一般读者均不清楚，为什么赛珍珠会连续写了四篇小说，来描写叙述这一场长江水灾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仅从《结婚妻》这部短篇小说集是看不出来的。不过，在《荒芜》这篇小说的中译本里，则以“译者按语”的方式有所说明。

《荒芜》译文，发表于《农林新报》，该刊由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《农林新报》社编印，也就是赛珍珠的丈夫卜凯所执教的单位。因此，对于这篇小说的写作缘起，似乎亦就有着一般读者所不掌握的信息。

这篇小说刊发在《农林新报》的“新地”专栏里。据编者介绍，这一专栏，“专载以客观的笔调，轻松流利的文字，描写农村一切现象。能于全文中带有令人感动的情绪的为上乘。文稿性质为(一)小说；(二)游记；(三)见闻实录；(四)乡村工作经验谈等”，而且对于语言之要求，也是“文言白话不拘”。

我总觉得，《农林新报》上专门开辟“新地”这样一个专栏，与卜凯以及卜凯夫人有着某些关联，如果说“新地”这一理念在经济上的前瞻，多少有卜凯的影子在，其在文学上的愿景，则似乎更多来自卜凯夫人赛珍珠。

小说的对象，完全是中国的农民，她是中国劳苦农民的靈魂深处的代言人。她的杰作《大地》(Good Earth)，久已脍炙人口，中国已有中文译本。还有《大地》的姐妹篇《儿子们》(Sons)，亦有中文译本。此外她的著作有：《东风西风》、《青年革命家》、《母亲》等书。以上都是长篇小說。短篇小说集只有《夫妻》一书。前次承她赠送编者一本。嗣后披阅，不禁有所感动。尤其书中描写1931年扬子江的水灾的文章，重读之余，更觉伤心。非特憾事也。那次水灾在中国，演了绝大的悲剧，被灾区域达14,500,000亩，农民遭殃者几及25,000,000人，而我国家除了失踪的丁玲女士写了一篇《水》以外，很少有人去写作这个伟大的题材。卜夫人是一位关心中国的作家，她写了许多描写这次大水灾事实的文章，就是《夫妻》中第三部的“洪水”中四篇。编者拟一一译出，在本报发表。据该书发行者Richard J.Walsh的叙言，卜夫人这几篇水灾速写，完全是为灾民乞援而写作的。她把这几篇文章交由水灾救济会，送至美国各地新闻报上去发表，因此先后获得赈款200,000余元，可见她的文字感人的力量之大了。

这段文字最引人关注之处有二，其一是赛珍珠《结婚妻》中的水灾四篇，都是为1931年长江水灾而写；其二是赛珍珠曾经将这四篇小说提交给美国水灾救济会，并为长江地区的灾民募集赈款。这也让我们弄清楚了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为什么赛珍珠当初会就同一个题材或主题，一连完成四篇作品。

如果稍加清理一下，亦会注意到，“洪水”四篇，其实也是赛珍珠最后一次集中描写中国农民题材。而无论是《大地》时期的系列农民书写(包括《母亲》《青年革命党》等)，还是“洪水”四篇，直接或间接，都与卜凯有关，换言之，亦就是与赛珍珠作为卜凯夫人的身份有关。就此而言，几乎可以说，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作品，基本上都是她以卜凯夫人的身份完成的，而卜凯的《中国农家经济》和《中国土地利用》这两部学术著作的前期田野调查乃至后期统计分析等工作，赛珍珠亦或多或少有所参与涉及。实际上，赛珍珠一生——主要就其在中国的四十一年——与中国农民的直接接触，亦就是她作为卜凯夫人的那段时间。而赛珍珠与中国的土地、农民以及农村的直接接触，均与卜凯亦就是约翰·布克有关。没有了卜凯，赛珍珠有可能既不会去安徽宿州，也不大会去南京，更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直接走近接触到那么多的中国农民。一个没有了中国农民和农村“支撑”的赛珍珠，更熟悉也更会去写的题材，应该就是《东风西风》，或者《儿子们》中的王虎三兄弟的故事，以及四处寻找不得出路前途、一直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王源的故事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学院副教授)

(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)